

指示性与符号人类学的新发展*

赵星植

摘要：相较于像似符和规约符，指示符最为特殊：它是唯一与语境相连接的符号，在锚定社会文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符号人类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逐渐将其研究重心从符号的规约性转向指示性，以重新审视社会生活中符号活动、语境及其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该路径发展至今，已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共同注意，并逐渐引领符号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为厘清这种独特的指示性转向，本文将梳理符号人类学中符号指示性的研究历史及其发展趋势，说明它为当今符号学与人类学的融合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符号人类学，指示性，语境，皮尔斯

Indexicality and Semiotic Anthropology

Zhao Xingzhi

Abstract: Index, compared with icon and symbol, is the only sign type that directly connects with context and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anchoring social culture. Since the late 1970s, semiotic anthropology has shifted its research focus from conventionality to indexicality to re-examine the mutual relations among semiosis, context, and historical changes in social life. This approa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nd has gradually come to lead the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皮尔斯学术手稿中的关键概念整理与研究”（18CWW002）阶段性成果。

development of semiotic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indexicality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emiotics and anthropology.

Keywords: semiotic anthropology, indexicality, context, C. S. Peirce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06

一、符号人类学的新发展

人类学以人类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而符号学则重点关注文化意义之解释，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接近性。在符号学兴起之前，早期人类学家的著述便已经体现出符号学思维的重要性。（叶舒宪，2005）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原始文化》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所谓“原始文化”的信仰观念以及“万物有灵论”的开创性探讨；弗雷泽（James Frazer）《金枝》和《旧约民俗》对远古巫术信念和仪式神话母题的跨文化比较与系统阐释；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Lewis Morgan）《古代社会》对印第安文化各民族部落的图腾分析；等等。

符号人类学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要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它主要立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志研究方法，研究人类文化的表意活动及其规律，它既对某个特定地区、民族或社群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深描，又通过符号学理论对这些田野数据进行思维上的提升和总结。

甚少有学者注意到的是，“符号人类学”这个术语在西文中有两种不同表述，即“symbolic anthropology”以及“semiotic anthropology”，它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纳日碧力戈，2019）。前者主要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基于索绪尔符号体系而开创的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以及后继者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特纳（Victor Turner）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所继续发展的象征人类学。相关学者集中关注文化社群中符号使用的规约性与象征性；通过对构成文化体系的象征的意义理解和阐释，探讨该文化所独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社会心理”乃至“文化的深层语法结构”。后者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美国本土兴起的以皮尔斯符号学为基础的符号人类学研究新潮流。该学科最早由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辛格提出（Singer, 1976），后主要经由雅各布森在哈佛的弟子、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大力推动而发展壮大。符号人类者如帕

门蒂尔 (Richard Parmentier)、莫茨 (Elizabeth Mertz)、芒恩 (Nancy Munn)、基恩 (Webb Kean) 等都为此分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分支被学界视为符号人类学的“皮尔斯转向” (Parmentier, 2016, pp. 10 - 15; Mertz, 2007): 相关学者利用皮尔斯符号学对符号使用、解释语境以及符号媒介物质性的关注, 使人类学摆脱由来已久的物质/心灵二元论。简言之, 他们主张符号及其意义生成是社群和语境互动的产物, 而非先在社会文化结构的体现——这也就走出了结构符号论的理论桎梏。

上述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当今符号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从符号规约性 (convention) 转向其指示性 (indexicality)。“皮尔斯符号学提供了一种非二元的意义理论, 由此超越并拓展了结构符号论仅对规约符号 (特别是语言和文化象征) 的狭隘关注, 而后者则恰恰是解释或象征人类学的关注焦点。” (Sicoli & Wolgram, 2018) 他们的理论实践, 主要是在皮尔斯符号学基础上, 积极融合雅各布森、沃尔夫、萨丕尔、巴赫金等人的理论, 着重探讨符号意义与社会语境之间的指示关系, 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指示性问题成为相关研究的中心问题。(Parmentier, 2016, pp. 3 - 23)

近年来, 中国符号学与人类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符号的指示性问题。例如, 纳日碧力戈的专著《民族三元观: 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2015) 在皮尔斯符号学基础上, 深入剖析和探讨了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特性。他认为皮尔斯的三性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气、神三元相关联, 并特别提出应当重视文化表意中的指示性因素, 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三元相通和文化平等。赵毅衡 (2017) 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 相较于像似性, 指示性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意义关系, 指示才是意义世界的基础性活动。彭佳的专著《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2021) 则专章论述指示性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基础。

为了探究这种独特的指示性转向, 本文将梳理符号人类学中符号指示性的研究历史及发展趋势, 说明它为当今符号学与人类学的融合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启示意义。

二、转向符号的指示性

符号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或者符号活动 (semiosis), 但这些符号活动的本质特性究竟为何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长久以来, 以结构和象征人类学为代表的传统符号人类学范式主要关心符号的规约性或任意武断性。它通

常对社会结构类别进行象征性陈述，从而分析仪式、神话、器物或其他社会行为的构成。这类研究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分析非常类似，即忽略语言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差异，从总体上去抽象并归纳语言的纯指称意义。

然而，象征或规约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文化的全部特征，因为符号除了能表达规约意义，还可以具有像似性和指示性。同时，语言符号学式的系统结构分析无法说明符号使用的历史变化与社会性，而这恰恰是人类学所关心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新一代符号人类学者逐渐转而关注社会文化符号的指示性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像似性成为唯一被忽略的领域。相反，他们认为像似和指示这两种符号理据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均被忽略，对两者都应当给予关注。

相较于像似符和规约符，指示符最为特殊：它是唯一与语境相连接的符号，在锚定社会文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根据皮尔斯的观点，指示符的作用是指出它所邻接的对象，“一旦失去了对象，指示符也就失去了使之成为符号的那种品格”（CP 2. 304）。指示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皮尔斯在手稿中多处举出许多指示符的例子：风向标、感叹词“哦”“喂”、几何图形上的附加字母、图例、专有名词、疾病症状、职业服装、日晷或钟、气压表、水平仪与铅锤、北极星、尺、经度、纬度、指示方向的手指，等等。（皮尔斯，2014，pp. 55 - 58）最后皮尔斯总结说“所有自然符号与生理症状”都是指示符（CP 3. 361）。这意味着，指示符恐怕是最基础的符号类型，因为它不需要经过更高级的再现活动，而且直接指出在语境中与其相临近的对象。

皮尔斯根据自己创建的符号现象学原则，认为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分别对应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所谓第一性，就是直接性和显现性，皮尔斯认为第一性就是我们对符号品质当下的、最初的、笼统的感觉，它不需要解释者将其经验化。第二性是实际性、经验性和事实性，它把第一性的感觉在实际的符号化过程中转化成感觉的经验。第三性则是普遍性、法则性和规律性，它是连接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中介，即符号的解释范畴化和规约化。（皮尔斯，2014，pp. 9 - 13）

按照皮尔斯的解释，像似符是第一性，这是因为符号与对象相似，是我们对任何符号品质所产生的直接感觉；他甚至认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就是像似性的。指示符作为第二性，是因为指示符要表达意义，离不开对象的存在，因而指示符关涉的是实际经验以及具体的符号事件。换言之，我们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实际感受到指示符正在指示它的对象，而像似符和规约符则不需要对象在场便能表意。至于规约符作为第三性，是因为它的意义由社群

所约定的解释规则决定，因而它不在乎解释者的直接经验，也不在乎它与对象的直接连接。

皮尔斯所谓的第一性，本质上是思维的直接性，即符号无需在思维中进行再媒介化。但是，究竟是指示性还是像似性更能说明思维的直接性，则是个值得讨论的议题。赵毅衡曾从与动物的对比、与幼儿的意义行为的对照以及指示词的作用方式三个方面，说明指示性可能是符号的原初理据性(2017)。他提出指示性不是第二性，而是第一性，因而是最基本、最原初的意义关系，可以不卷入经验就产生意指关系。应当说，从经验的角度出发，赵毅衡教授的这一论点是非常有价值的。指示符不需要解释再现对象或对其进行再媒介化，也就无需使符号使用者卷入更多的再现活动或表意行为，因而是最能直接反映符号使用状况的一类符号活动过程。

本文认为，当前以指示性为中心的符号人类学新范式虽未直接卷入指示性是否为第一性的讨论，但相关研究已清楚阐明：从语言符号到非语言符号活动，指示符对人类文化秩序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新一代符号人类学者甚至认为，既然符号人类学的根本任务是探求影响社会文化的具体符号表意机制，那么指示性就应该是其基本出发点，因为唯有指示符与具体的文化语境实实在在地关联在一起。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说明，中外学者如何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案例探究证明指示性对社群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三、移指词与语言符号的普遍指示性

符号人类学转向以指示性为中心，是从社会文化中的语言问题开始的。指示语是最常见的指示符，例如“我”“这个”“这里”“现在”等。这类词语最大的特征是其指称对象随着说话人所处语境——例如时空位置等——的变化而变化。指示语又被称为移指词 (shifter)，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此类语言符号的具体特征。以人称代词“我”为例：在一段对话中，说话人说“我”，听话人要理解“我”这个词的含义就必须借助它约定俗成的符码意义，即“我”指代说话人自己；与此同时，他若要真正理解这段对话中的“我”的含义，就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将“我”的指称意义转换成“你”即说话人。因此，指示语的最终意义并不由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决定，而是由其指示的对象和语言决定。

语言哲学界对移指词的研究成果颇多。最早关注移指词的是叶斯帕森 (Otto Jespersen)，他认为语言文化中的这种偏离指称现象是广泛的。“儿童听

到的‘I’，有时指父亲，有时指母亲，有时指叔叔，‘I’的指称随说话人的转变而移动。”（Jespersen, 1922, p. 123）哲学家罗素认为指示语的本质是“自我中心词”（egocentric particulars），意思是说语言使用者与语境的相互关系决定着指示语的指称意义。若具体语境中出现位置关系、时间关系以及人物关系等的变化，指示语的含义也随之发生改变。

符号学对移指词的关注始于雅各布森。他将其命名为“双重符号”（duplex sign）（Jakobson, 1957, pp. 119 - 121），意思是这类符号的指称意义可以同时与符码（code）和信息（message）之间来回运转。他借助皮尔斯符号学进一步指出：移指词就是“规约性指示符”（symbolic index），它一方面指称符号的规约性意义（符码义），另一方面指称其指示义（语境义），但最终对该符号表意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语境，因此“如果不指涉已知信息，则移指符的一般意义无法确定”（p. 121）。

雅各布森之后，其学生西尔弗斯坦以移指词为突破口，推动人类符号学转向关注符号指示性（Silverstein, 1976, pp. 11 - 15）。西尔弗斯坦指出，移指词在人类文化中并非特例，它们在不同的语言社群中大量存在，例如时态、语态和指示语等。并且，移指词只是规约性和指示性的混合，其他更多纯指示性的语言符号活动同样具有这种锚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西尔弗斯坦指出，20世纪以来，人类学研究中的诸多经典案例已经说明了符号指示性的重要作用，只是当时学界并未意识到可以从符号学角度对现象进行系统梳理。

例如，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 1923）对雅拿语（Yana）的经典研究便发现某些语言的性别指示可成为指示性的语言系统类型，它在指示和建构社会性别关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在雅拿语中，男性之间的对话会采用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而男性与女性对话则会采取其他形式。这两种对话体系中那些对等的词汇具有完全相同的语义指称作用，特定的听话人和说话人只会从语用上而非语义上去判断该采用哪种对话体系。显然，是性别指示和社会语境共同决定了语言的具体含义。

在美国东南部的科萨提语（Koasati）中，女性所说的每一个动词都添加一个后缀“-s”。他人转述时会保留这些后缀，由此，被转述人的性别就被指示性地保留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后缀“-s”并不提供任何语义信息，但它的存在与否却能指出说话人社会性别范畴的信息。（Haas, 1944）

这种语言符号的指示性不仅存在于性别指示之中，还同样存在于语用原则之中。人类学学者迪克逊（Robert M. Dixon）发现，昆士兰北部凯恩斯雨林中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在语用行为中的礼貌原则方面具有强烈的指示

性。这种语言非常特别，它同时具有两组不同的词汇：一组是日常词汇，另一组则是所谓的“岳母”（mother-in-law）词汇，后者只能由该语言社区的人在其岳母或类似姻亲面前使用。（Dixon, 1972）岳母词汇与日常用语完全不同，它指的是说话者与某些听者之间的特定亲缘关系。因此，词汇转换在言语情境中充当了亲缘禁忌的指示符，保持并创造了社会距离。也有人类学学者在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中发现了语言符号与文化的指示关系。例如李文筠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在该地普米族人使用的语言中，存在“Ꞩ³⁵”这一重要概念，意思是“骨头”“根根”或“骨根”，主要指示人的身体、认识与其物理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结。（李文筠，2015）

上述例子表明，指示性现象不仅存在于移指词中，还存在于其他更普遍的语言符号现象之中。指示符因其与空间、时间和社群的直接关系，让符号使用者能在指示性的表意过程中锚定其与所处世界的关系，甚至由此建构社会交往的秩序和规则。同时，移指词以及其他纯指示符的意义并不由语法或语义规则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语境决定，那么对于这些指示符的研究就不应当局限在语义层面，而应当拓展到语用层面。反过来说，既然只有指示符能与文化社群直接相连，那么我们只有抓住指示符的语境指示意义，才能真正探究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本质关联。从符号人类学的范式转向角度来看，对移指词及其语言指示性的研究带来的启发意义如下：

第一，从符号表意功能来看，符号不仅具有指称功能，还具有非指称功能。所谓指称主要是指语义指称，即一个符号所对应的外延和内涵。就语言符号而言，这种指称性因为文化规约的因素而变得相对固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符号的意义就被固定下来，因为这样我们就无法说明符号交流的多义性和多功能性。例如，在以移指词为代表的指示性符号表意中，确定该词含义的不是语义而是语境因素，即它所实际指示的对象。

推而论之，语言符号的普遍指示性昭示的是奥斯汀（J. L.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等人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符号不仅能够表意，还能够“行事”（performance）。因此，语言或者更广义的符号交流是一种行动（act）。究其根本，这是因为符号具有广义且普遍的指示功能，即它能指示符号使用者产生实在的社会文化效果，进而实现社会交际的目的。这正如“今天有点冷”这句话的最终目的可能并不是陈述天气状态这一事实（即语义含义），而是在指示具体语境，提示听话者是否能帮忙关上窗户（即语用功能）。

在言语行为中，这种符号指示功能普遍存在。例如，我们经常通过语言

为人际互动设置社会界限，而不是用物理隔离的方式把某些说话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选择说话的语言，从而让在场的某些人无法理解；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需要加入代词标记，以明确我们期望的参与界限；我们可以使用只有一些人能理解的短语；我们可以在不识字的人面前用某种书面语言拼/写出文字。因此，指示性符号同样实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符号交际可以遮掩隐私，显示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命令某人做某事。这些都是语言符号学所具有的普遍指示功能产生的具体社会交际效果。

第二，既然人类文化中的符号指示因素普遍存在，那么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就是符号人类学的现有方法论是否依然有效。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14）指出，我们应当承认符号除了能表达指称性含义，还可表达非指称性的语用意义，而后者则主要是符号指示性的实现。语言符号构成话语，并在对话中承担着诸种社会建构功能。在传统语法分析中，我们分析这些符号如何指称命题。然而，当我们考虑语言符号更广泛的实际应用时，便会发现需要研究的并不只是这类语言的语义意义，而是包含语用意义在内的全部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从话语事件中目的性话语的事实出发，把语言的几种功能分离开来。语言符号根据自己的本质特性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意义。某些语言符号具有语义意义，目的在于指称；其他语言符号具有语用功能，目的在于实现其交际功能；等等。而新的符号人类学范式便是以探究符号指示性表意为基础的语用研究。西尔弗斯坦继续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在本质上依然是最传统的语义指称分析，它只不过是附带说明了这些语义-指称类别是如何用来行事的。这种方法完全忽略了一个观点，即非语义性的符号指示活动与语义性的符号规约表意同样具有目的性，并且前者比后者在文化中更为普遍。（Silverstein, 2014）

四、文化的普遍指示性：重构文化与社会语境之关系

在指示性概念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分析把社会文化中的意义范畴标记为指示性。同时，符号人类学者逐渐赞同，应当把符号视为一种混合物，即它在现实语境中是像似、规约和指示的三性混合，或者至少两种特性的混合（Mertz, 2007）。这意味着符号意义的一部分必然与语境直接发生关系，它作为一种单独的表意模式，在分析上独立于那些基于社会规约的且去语境化的语义内涵或象征意义。社会生活主要是人与人的互动，以及对物质之意义的对象化过程，这些都离不开符号的指示性作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人类学及其相邻学科都存在上述指示性转向，总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符号指示性与社会语境

调查与访谈是人类学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而指示性转向使其更加关注“真实谈话”（Greenhouse et al, 2002；Wortham & Reyes, 2015）以及真实社会语境对人的自我认知、社区认知以及文化认知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他们看来，谈话活动中的符号话语是直接指出社会语境的指示符，是揭示社会文化生活特征的关键切入口。于是，现有人类学越来越重视整合语言社会学、会话分析以及民族方法学有关语言符号之语境构造（contextual structuring）的理论成果，突出语境指示性在民族志分析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在对政治、法律、霸权结构以及身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中，语言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就融入其中。这种方法仔细检查符号与语境指示之互生关系，同时也仔细反思地方、国家和其他语境在相关活动中的重要影响（Agha, 2006；Briggs & Mantini-Briggs, 2000）。

具体来说，在语境指示性研究方面，符号人类学试图跟踪研究那些在社会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多层次的复杂语境因素。例如，学者们借助社会学者戈夫曼（Goffman）提出的“话头”（footing）这一概念（Agha, 2005），来探究说话人在社会权威层面上的位置变化。讲话者只是话语的执行者，但真正的说话人很有可能是其他人，例如，某人朗读了别人写的演讲稿。甚至，这一所谓真正的说话人也可能不是权威的或最主要的话语来源，例如，某机构的董事会聘请了一名演讲稿撰写人来撰写演讲稿，并聘请了一名发言人来发表演讲。因此，“话头”作为指示符，指示话语双方在真实的对话语境中的权力关系和位置的改变等。符号人类学者认为，通过话头可以详细探究指示符在具体机构组织如学校（Wolfgram, 2014）和法庭（Hirsch, 2006）等以及更宏大的社会语境中（Agha, 2006）所发挥的现实锚定作用。

（二）符号指示性与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分析是人类学的最主要领域之一。在皮尔斯符号学特别是指示性转向的影响下，此类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方面取得许多新突破。这一路径的起源是美国人类学者南希·穆恩（Nancy Munn）在皮尔斯第一性概念影响下开创的质符分析（qualisign）。她用该概念去分析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群岛上物的生产、消费与交换体系中的价值（value）问题。她

的核心议题是，文化意义上的品质 (quality)，如“轻快” (buoyancy) 或“轻盈” (lightness)，可以通过不同物质或感觉对象来体验，例如，潮湿和广阔的大海、鱼的游动、鸟的摇摆，或轻快的舞蹈，等等。(Munn, 1992) 因此，“轻盈”这一质符可以通过独木舟、小菜园、装饰物、身体等物质得以实例化。穆恩对品质的分析，正如皮尔斯所述，是“纯粹抽象的潜能” (CP 1.422)，不依赖于精神，不依赖于某种物质实体，也不依赖于感觉。品质属于第一性范畴，“不指向任何事物，也不存在于任何事物背后” (CP 1.356 - 357)。

但品质或质符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必须要具体地体现在某种事物之中。一旦被具体化了，它们实际上还常常和其他品质偶然地关联在一起，比如苹果的“红色”常常与“球形”“重量轻”等品质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指明了物质性的一个显著且重要的作用：除非“红色”被具体化，且在此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品质“绑定”在一起，否则它不可能显现出来。而这种具体化过程就成为生活中的那些偶然且实在的因素，这便落入了指示性的范畴。“绑定”是品质可能性的一个存在条件，卡皮托夫 (Kopytoff, 1986) 与阿帕杜莱 (Appadurai, 1986) 将其称为物质的“传记” (biography)。这是因为那些被绑定在任何物质中的质符，都将会在语境中移入它们的相关价值、效用以及关系，这是物质文化研究转向符号指示因素的前提。

因此，“指示性”这一概念就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如学者韦伯·基恩 (Webb Keane) 指出，许多对社会语境进行物质性分析的重要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指示性”这一概念 (Keane, 2003)。然而，要使“指示性”在分析中 useful，我们就必须面向可能的未来以及既有的过去来理解这一概念。因此，基恩指出符号人类学对物质的指示性研究应当拓展西尔弗斯坦的指示性讨论，后者认为符号指示性在两个维度上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是“预设” (presupposing)，即解释者在指示符被实例化之前，就预先知道该类符号的语境锚定因素；第二是“创造” (creative)，即生成或包含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符号，或者它至少可以使解释者在认识层面凸显语境这一关键要素。不重视这两点，我们便会对指示符进行误读，认为某些物品或事物似乎天然地具有某种品质或具有某种自然立场。人类学者则是要在社会语境中，寻找出某种特殊品质和语境之间的指示性建构关系。

沿着上述路径，关于物质之符号品质的指示性研究正在成为符号人类学的一条独特研究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哈克尼斯 (Nicholas Harkness) 引领的“感觉质” (qualia) 系列研究。他指出，穆恩的

研究以皮尔斯的第一性概念品质为基础，但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从经验到的具体事物去分析这种抽象的可能性。(2015)他认为我们对品质的经验是由皮尔斯所谓的“感觉质”构成的，因此感觉质是品质的实例化，它与我们的思想、所经验的物质以及我们的感官相连。因此，品质属于第一性范畴，但感觉质则是“第一性的事实”(Peirce, 1998, p. 272)，属于第二性范畴。感觉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像似，即某物可以直接展示某种品质；二是指示，即某物可以展示它与某个品质相关联(Harkness, 2013)。

基于上述框架，哈克尼斯调查了“柔和”(soft)这一品质在韩国烧酒文化中的体现(Harkness, 2013)。他指出，在韩国，“柔和”最能体现在“喝烧酒”这一社会仪式所蕴含的感觉质中。“柔和”作为品质是第一性，而“喝烧酒”这一仪式可以作“柔和”的感觉质；感觉质作为第二性范畴，能具体说明韩国社会文化语境如何指示“柔和”这一品质。他把田野调查和广告文本研究相结合，具体分析不同感官形式的烧酒消费，比如味觉、听觉、行为以及醉酒状态等，通过何种具体文化符号的渲染途径，去经验“柔和”这一抽象品质。他提出“品质及物性”(qualia transitivity)这一概念，说明这种以指示性为基础的、同一符号品质之不同实例间的跨模态感知模式。在这一指示性理论框架下，哈克尼斯得出结论：烧酒的感觉质及其消费模式的剧烈变迁所体现的是韩国现代社会对酒和性别关系的重新概念化。

因此，指示性转向下的符号学人类学，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以“感觉质”作为中心理论概念。感觉质作为一种指示符，在人类文化活动中以感官品质的形式得到体现。所以，人类学学者可以在田野中通过人们对“行为的感觉”(feeling of doing)的描述，获得感觉质的符用效果。他们主要围绕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实践、社会交际实践、物质的建构以及身体经验等，来分析文化品质在社群活动中的指示关系及其符号化过程。

(三) 符号指示、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

指示性转向给符号人类学研究带来的第三个重要影响，是它为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建构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 2014)指出，我们的元语言活动存在着明显的“指示秩序”(indexical order)，即一级指示性、二级指示性，直到N级指示性。并且，如前文所述，指示性具有预设和创造两个功能。因此，元语言活动中任何级别的符号指示性都会预设与该符号关联的语境具有某种特定的图示类型。这种特定的语境图示类型作为一种“得体”(appropriateness)的规范，指导我们根据语境对

不同指示秩序的元语言活动进行建模 (model)。这种语境图示的存在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干预功能存在于不同的指示秩序之中, 换言之, 文化和族群意识、元语言因素等以符用得体性的方式, 参与到符号与语境的指示关系建构中, 进而影响符号价值的实现关系。

这种微观的指示关系分析表明, 表意双方在符号交往活动中为达成理解并使自己的符号活动得体, 在元语用 (meta-pragmatic) 层面时刻都在进行复杂的校准, 它使我们对符号的理解时刻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同时,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指示性意识,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正在进行互动的语境、社群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入互动文本中, 这使我们在元语言层面把符号活动变得合理化。符号人类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便是沿着这一路径推进的, 即它把元语言结构和符号意识形态之关系视为符号结构与社会语境互动的关键点。对于这一关键点的分析, 可以探究语言与符号交流如何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 意识形态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被编织到符号使用双方的元语言结构之中 (Mertz, 2007)。

在上述理论路径影响下, 符号人类学者开始关注某些具体的文化观念经由何种指示性符号过程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 中国学者彭佳等人的研究, 便很好地说明了符号指示性如何成为民族与文化认同的根本机制。研究指出,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 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 因此, 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 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在指示性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 认为龙“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 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之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 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彭佳, 何超彦, 2021)。

在元语言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 相关学者借助皮尔斯的“呈符” (rhema) 概念, 说明某些社会交际符号中能指示社会差异的某些标志性品质被合理化为特定社群的行为特征, 如行为、情感、道德等 (Irving, 2004)。皮尔斯说, 呈符型符号表意的目的在于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符号本身 (CP 4. 38)。换言之, 这就是把所有符号活动背后的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全部压缩到符号自身, 让符号成为这些社会因素的合理化再现, 这一过程被称为“呈符化” (thematization) 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 是符号指示意义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自然化过程; 符号使用者按照特定的方式对该符号以及符号活动进行固定解读, 进而实现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例如, 学者邦尼对文科教育的商品化现象所进行的深刻剖析指出, 文科教育往往把“好学

生”作为高度指示性的符号指称着高等教育的价值，这种符号通过视觉和叙事等手段呈符化为可以交流的“商品”，并由此把教育与学生家庭的未来绑定起来（Bonnie, 2014）。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学者井上对日本女性的符号话语的人类学调查。他指出，在19世纪晚期，日本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代表精英阶层的女大学生在讲话中的某些语言形式是堕落和粗俗的，例如她们说话常常缺少敬语，省略动词结尾的语音等。这些知识分子的评论从元语用层面把女大学生与所谓“堕落的西方人”联系起来，进而对女大学生的语言进行合理化解释。因此，这些评论便把指示符（即语言特征）与指示对象（即女大学生）的指示性关系呈符化为像似性关系，从而让解释者认为语言形式和话说者都是堕落和粗俗的。（Inoue, 2004）这意味着，解释者可以在元语言层面对符号表意的指示关系进行再解释，将指示关系固定为无需依靠语境的像似性关系，而这便是意识形态在符号活动中的操作化体现。

综上，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赵毅衡, 2016），但这些符号的性质常常是由像似、指示与规约混杂而成的。传统符号人类学主要关注符号规约性，忽略了符号指示性在社会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建构作用。当今符号人类学研究转向以符号指示性为中心，既是符号学理论与人类学研究进一步融合的最新趋势，更是对现有研究范式的一种纠偏。

引用文献：

- 李文窃 (2015). 亲属、族群性与地景：从中国云南普米族人的“根骨（ꞗ³⁵）”谈起. 考古人类学, 82, 91 - 156.
- 纳日碧力戈 (2015). 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 纳日碧力戈 (2019). 符号人类学的两种阐释.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7, 289 - 297.
- 彭佳 (2021).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彭佳, 何超彦 (2021).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民族学刊, 1, 26 - 34.
- 皮尔斯 (2014). 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叶舒宪 (2005). 从符号人类学到“符号经济”——文化资本博弈时代的文学增值术. 江西社会科学, 12, 14 - 21.
- 赵毅衡 (2016). 文化：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合. 社会科学战线, 8, 147 - 154.
- 赵毅衡 (2017). 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 6, 104 - 113.
- Agha, A. (2005). Voice, Footing, Enregistermen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 8 - 59.

□ 符号与传媒 (25)

- Agha, A. (2006).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adurai, A.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nnie, U. (2014). The Semiotic Production of the Good Student: A Peircean Look a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Signs and Society*, 2, 1, 56 – 83.
- Briggs, C. & Mantini-Briggs, C. (2000). “Bad Mothers” and the Threat to Civil Society: Race, Cultural Reason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 Venezuelan Infanticide trial. *Law & Social Inquiry*, 25, 299 – 354.
- Dixon, R.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house, C. et al. (Eds.) (2002). *Ethnography in Unstable Places: Everyday Lives in Contexts of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kness, N. (2013). Softer Soju in South Kore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1/2, 12 – 30.
- Harkness, N. (2015). The Pragmatics of Qualia in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 573 – 89.
- Hass, M. (1944). Men’s and women’s speech in Koasati. *Language*, 20, 3, 142 – 149.
- Hirsch, S. (2006). *In the Moment of Greatest Calamity: Terrorism, Grief, and a Victim’s Quest for Justi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rvine, J. Say When: Temporalities in Language Ideology.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4, 1, 99 – 109.
- Inoue, M. (2004). What does Language Remember? Indexical Inversion and the Naturalized History of Japanese Women.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4, 1, 39 – 56.
- Jakobson, R. (1957).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epersen, 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Keane, W. (2003). Semiotics and the Social Analysis of Material Things.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 3/4, 409 – 425.
- Kopytoff, I. (1986). The Culture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64 – 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nn, N. (1992). *The Fame of Gawa: A Symbolic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a Massim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rmentier, R. (2016). *Signs and Society: Further Studies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931 – 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P. Weiss & A. W.

- Burks.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ume II: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apir, E. (1923). *Text Analyses of Three Yana Dial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coli, M. & Wolgram, M. (2018).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Biographies in Anthropology*. DOI: 10.1093/obo/9780199766567 - 0187.
- Silverstein, M. (1976).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H. A. Selby & K. H. Basso (Eds.),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11 - 55.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Silverstein, M.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 3/4, 193 - 229.
- Silverstein, M. (2014). Denotation and the Pragmatics of Language. In N. J. Enfield, Paul Kockelman & Jack Sidnel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28 - 1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M. (1978). For a Semiotic Anthropology. In Thomas A. Sebeok (Ed.), *Sight, Sound, and Sense*, 202 - 20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olgram, M. (2014). Gestur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Mathematical Ontologies in Classrooms.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4, 216 - 237.
- Wortham, S. & Reyes, A. (2015). Discourse Analysis beyond the Speech Event. *Revista Espanola de Linguistica Aplicada*, 29 (1), 338 - 343.

作者简介:

赵星植, 博士,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皮尔斯符号学、传播符号学和符号人类学。

Author:

Zhao Xingzhi,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ISMS research team. His recent research fields mainly cover Peircean semiotic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and semiotic anthropology.

Email: xingzhi.zhao@scu.edu.cn